

观和历史观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应该既包括自然观又包括历史观，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我与黄老师私下表达过我的这种看法。但黄老师并没有因此而让我参加这个课题组，他仍然对我的观点持包容态度，让我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一篇。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十分注意，尽最大的努力不写与黄老师不同的观点。我借黄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在这一篇中写进了我的一些近期研究成果，使我以前形成的历史唯物

主义的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有了一些新的面貌。这是我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取得的又一成果。

黄老师离开了我们，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大损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对黄老师的辞世感到万分悲痛。我要化悲痛为力量，以有生之年继承黄老师的未竟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尽绵薄之力。黄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黄枬森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

刘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摇摇黄枬森先生无疑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他不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骄傲，也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骄傲。先生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已广为大家所熟知。可是，对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的渊源或许知之者并不多。在近60年的时间里，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他与学报是“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成长和前进的”。^①作为作者，他以精品力作作为学报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作为编者，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为学报排忧解难、掌舵导航。先生走了，但他以自己一生的心血，用学术和学报，为自己建造了两座丰碑。

一

先生说，从《学报》诞生之日起，自己就是它的忠实读者，不断地从中获取所需的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从《学报》诞生之日起，自己就成了它

的坚定的作者。的确，先生经常给学报惠赐名篇佳作，为学报增光添彩。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文革”十年外，先生每年都会在学报发表一篇文章，有的年份甚至是两篇。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可谓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窥见先生和《学报》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六十年来所共同走过的学术足迹，可以感受到先生“思维之活跃”与“用力之勤”；分析这些文章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真正体味到先生的“治学之宽”和“功力之深”。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虽然六十多年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决不囿于一门一派，而是强调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和综合创新。这种学术追求，不仅从他自己发表在《学报》上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而且，还表现在他与其他各领域的学者联系非常紧密，表现在他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总是吸纳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学者参加^②。或许，这与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

① 黄枬森：《同呼吸共命运的五十年》，《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黄先生总是谦虚地说：“我所获得的学术成果，都是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与学者们在共同讨论(包括争论)、互相切磋、密切合作中做出的，都是集体的成果。”参见黄枬森：《我和哲学》(2012年12月27日未完稿)。

文化教育以及在大学期间“醉心于西方哲学,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西方哲学”^①有关。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要创新,就必须与现时代、与现代科学、与中西方哲学结成联盟。他的这种学术视野,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走出困境是极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的。

1955 年《北京大学学报》创刊,其中,就刊登了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和黄枏森四位先生共同撰写的文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动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尽管文章的内容有以政治代替学术之时代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思想风貌。

《北京大学学报》上,有奠定先生学术地位的代表作。20 世纪 60 年代,先生关于列宁《辩证法的要素》的独创性的理解,就是在这里首发的。如,1963 年第 6 期《列宁如何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1964 年第 2 期《读列宁辩证法十六要素》。

改革开放以后,先生更是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硕果累累,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系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如,1979 年第 2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纪念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七十周年》;1979 年第 3 期《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陈志尚、张翼星等合作);1981 年第 1 期《一个涉及多方面基本理论的问题——重提真理的阶级性问题》(与陈志尚合作);1982 年第 5 期《试评人的本质的异化》;1987 年第 1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1988 年第 1 期《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与赵光武合作);1991 年第 4 期《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1992 年第 1 期发表《关于主体性和实践的几个问题》,等等。也有一些是对前辈学者的学术反思。如,1980 年第 4 期《评 1964 年对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批评》;1994 年第 6 期《对

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的重新认识》;2005 年第 3 期《张岱年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

先生在 1998 年第 2 期《学报》上刊载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文,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这是我校出版物第一次获此奖项。

先生晚年也是退而不休,老当益壮,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代表作有:2001 年第 2 期《辩证唯物主义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2005 年第 5 期《论哲学研究的对象》;2007 年第 5 期《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思考》;2008 年第 5 期《黑格尔与经典作家论哲学体系的逻辑展开》;2010 年第 1 期《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2011 年第 5 期《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等文章。很荣幸,我是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这些文章大多数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学术文摘》等刊物上全文转载。这些都为《北京大学学报》赢得了荣誉,扩大了学报的社会影响力。

可是,在荣誉和利益面前,先生总是退让,想到的总是别人。他谦虚地说自己“是在《学报》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成长的”。若干年前《北京大学学报》募集到一笔捐赠,作为优秀论文的奖励基金,每两至三年评选一次“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以先生的佳作名篇,入选优秀论文是当之无愧的。可是,作为编委会主任,在一至八届的评选中,黄先生总是想着把机会让给别人,希望能更多地调动其他作者的积极性,坚持自己的论文不参加评选。直到 2012 年第九届优秀论文奖的评选中,因为黄先生已不再担任编委会主任,他才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大家评选的结果。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先生开始成为《学报》的编委,1987—1990 年担任《学报》副主编,1991—1994 年担任学报主编^②,1994—2010 年春天担任《学报》编委会主任。黄枏森先生担任编

① 黄枏森:《我和哲学》(2012 年 12 月 27 日未完稿)。

② 当时的主编、副主编相当于后来的编委会主任、副主任,负责实际编辑工作的还是编辑部的同志。

委会主任,并不是挂一个虚名,从一开始他就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说起先生与《学报》的缘起,这里还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8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时任北大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朱德熙先生非常重视北京大学报,非常重视编委会对学报的咨询、监督和指导作用。他亲自担任学报主编,学报编委会的成员也都由他选定。除了挑选一般编委外,他还特别挑选了黄枬森、厉以宁、金开诚三位著名学者协助他管理学报,担任学报副主编。朱德熙副校长把几位副主编和学报编辑部的负责同志邀请到他家里,一同商讨学报的办刊宗旨、组稿计划和稿酬标准等。后来,厉以宁先生由于校内外事务较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过问学报工作;金开诚先生因工作需要调离北大,学报的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朱德熙副校长委托的主管学报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黄枬森先生肩上。从那时起,黄先生就一直担当主管学报的重任,几十年如一日。黄先生不负重托,利用他的威望、学识和影响,以学术大家的胸襟和气度,关心和指导学报工作。

黄先生对编辑部的同志从来都是轻言细语、和颜悦色,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不与他打交道的人是难以体会到他待人“平等”和“宽厚”的意境的。

先生家住在朗润园,我们去他家中汇报工作,有时候他会在一楼门口迎接;我们告辞的时候,他经常会执意送到一楼门口。送他审阅的稿件,我们请他写完审读意见后打电话我们过去取,可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会亲自送到编辑部,从一开始骑自行车,到后来蹬老年助动车。实在来不了的时候,他会请他女婿代送。很多次,望着先生多少有点踉踉跄跄的背影,我们有说不出的感动。

先生审稿宽严相济。一方面,坚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传统,倡导“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不以一派一别或自己的喜好作为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即使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论文,只要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认为都是可以发表的。正如南朝的文学大家刘勰所说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另一方面,他也非常讲原则,有底线,外柔内刚,旗帜鲜明,丝毫不隐瞒自己的

观点。倡导优良学风、文风和作风,反对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晦涩文字或生造词句;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反对拉关系走后门。

先生非常认真地审阅送审的每一篇论文,尤其是定稿后的清样。对于每一期清样,先生会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宽广的学术视野非常认真地审阅、把关,并写出审稿意见。编辑部也很尊重先生的意见,总是根据他的建议修改或调整稿件,从而保证了学报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

如,2009年11月对学报第6期清样,先生写了整整两页审读意见,批评也很尖锐。特别是对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他认为内容似乎是在阐明“五四”的丰富性,但事实上是在重提过去反对学生运动的主要借口——耽误学业,《北京大学学报》不能这样去纪念“五四”。黄先生写道:“谁否认过学生入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呢?谁主张过学生应该天天上街游行示威呢?问题是:刀枪已架到我们脖子上,难道我们不应该起来反抗么?……此文发表出去,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根据黄先生的审读意见,我们马上撤换了稿件。

先生身为学报编委会主任,在学术界声名卓著,因此,许多稿件都是直接寄送给他本人的。但他从来不向编辑部推荐稿件,一律转给编辑部处理。他还特意告诉我:“凡是我转来的稿件,都按照编辑部的审稿程序办理,不需要任何照顾。”

先生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在学术界也很有建树,而且有的是享有盛名的学者。有时候,他们直接投给编辑部的稿件我也会请先生审稿,先生并不因为作者是自己的学生、因为作者的盛名而放低要求。如,2006年7月我把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稿件送请先生审阅,过了两星期,先生给我回信,写了整整一页的审阅意见,指出“作者一开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总的概括,这个概括就有片面性。恩格斯把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的哲学贡献,即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诚然包括了人的哲学,但把人的哲学夸大为马克思的整个哲学就片面了”。在信的末尾,他还很客气地说:“由于最近身体不适,回信晚了,十分抱歉,请谅。”其实,应该说抱歉的是我们,先生那么大年龄,不免年老体衰,而

我们还时不时去麻烦他。

先生有时会利用他在学术界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来为学报组约稿件和笔谈,如 1990 年第 1 期,他组约了“入学问题研究”笔谈,作者除了他本人外,还有陈先达、赵家祥、陈志尚、夏甄陶、袁贵仁、朱德生、王锐生、靳辉明和施德福等校内外哲学界的著名学者。

2007 年第 6 期,先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已基本完成初稿,在此基础上,先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笔谈”。参与笔谈的作者除黄先生本人外,还有赵敦华、孙熙国、曾国屏、王东等知名学者,从作者的学术背景来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科技哲学。这组笔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9 年,由于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本着对学报高度负责的精神,先生多次向学校领导提出辞去编委会主任职务。他对我们说:“我年龄大了,有些力不从心,难以组织和发动编委的作用,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学报的发展。”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学校同意了先生的请求,改请他担任顾问。

正是由于有黄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的指导,学报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1995 年,入选新闻出版署举办的首届全国期刊评奖。2001 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展”最高层次“社科双高期刊”。2003 年 11 月,入选首批教育部名刊建设工程。2005 年,连续荣获三届国家期刊奖。2009 年《北京大学学报》荣获“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2012 年 6 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北大学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黄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可以说,学报的发展,黄先生功不可没。

三

当年,我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就已久仰黄先生的大名,熟读了先生的许多论著,有的还作为教材学习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笔记》注释》等。1997 年秋天有幸来北大哲学系

师从赵家祥先生,也有幸认识了黄树森先生。按辈分论,黄先生是赵先生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爷”。在读博士期间,与黄先生交往不多。由于年事已高,当时黄先生已不再单独开课,我们只能在学术研讨会或个别讨论课上,聆听到黄先生的发言。

毕业以后,由于工作关系,与黄先生的联系渐渐密切起来。

首先,来学报工作就与黄先生有直接关系。2000 年 6 月,博士毕业之际,我联系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学报》虽然一直人手很少,一直没有哲学编辑,一直给学校打报告想进入,可是,直到当年毕业生都已分配了工作,学校的进入指标才落实下来。因为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的学报负责人请我导师赵家祥先生推荐,赵先生便问我愿不愿意去学报。我回答说,虽然很留恋北大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但我毕竟已到社科院马列所报到,而且教研室领导都已找我谈话,改派的希望不大。如果学报出面,能把改派的事情办成,那我就同意回北大。果然,学报去和社科院交涉的时候,社科院不愿意放人,因为他们也严重缺编,当年的进入计划也还远没有完成。最后,作为学报编委会主任的黄树森先生出面了,他挨个给社科院马列所的几个领导打电话,告诉他们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队伍的现状,已严重青黄不接,希望他们能给予理解和支持。因为黄先生德高望重,又是前辈和老师,马列所的几位领导这才同意进行调剂。这样,我就成了来学报工作的第一个博士。

先生总是以其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记得我刚来学报的时候,有一次,和他谈到人名用繁体还是简体的问题,他说一般要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繁体字、异体字可以保留。他举例说,他的名字中“树”最好不要写成“榘”,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就写作“树”,如果简化了,领稿酬等就有可能遇到麻烦。当然,如果有的电脑中没有这个繁体字、异体字,使用简体也是可以的。后来,我在《咬文嚼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姓名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不要简化,便很有感触。

有时候,先生会和我一起商讨组稿计划,特别是哲学方面的选题。一些学术研讨会他也会通知

我参加,看能否在会上组几篇论文。

先生不仅关心我的工作,而且也很关心我的学习。每次出了新书,他总是认认真真题签后送给我。先生承担的课题,有的也吸纳我参加。在编辑先生的论文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

先生乐于帮助别人,却总不愿意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我们在筹备第九届学报优秀论文颁奖时,因为先生是编委会顾问和论文获奖者,程郁缀主编安排我在颁奖当天开车去请黄先生参加。可是,当我给黄先生打电话时,他却说现在身体大不如以前,已不能行走,要坐轮椅,办一个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很多,他就不来给大家添麻烦了,临了他还不忘要我代他向编辑部的同志问好和表示谢意。

有的学者指出,先生继承了北京大学李大钊、冯定等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李大钊到冯定

再到黄枬森是一脉相承的。的确,先生对李大钊的学问和人品都很敬重,也把李大钊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2007年,先生曾送给我一副他亲笔书写的李大钊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特意注明“四月二十八日为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八十周年纪念日,录此联与刘曙光同志共勉”。

(见封三)先生送我这副对联,意在勉励我办学报要关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弘扬正气和主旋律,自身要做到“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的述志和写照,是黄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办刊人须臾不能忘记的座右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先生的道德文章,是我们学报人永远的榜样。“弘扬民主与科学传统,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事业做出进一步贡献”^①,这是黄先生对《学报》的希望,也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

(本栏责任编辑摇摇管摇琴)

① 学报创刊50周年时,黄枬森先生给学报的题词。